



张宗祥校勘《国榷》始末

□ 柴伟梁

副研究员,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,著有《眉轩香影陆小曼》等

西泠印社第三任社长张宗祥(1882~1965)不仅是书法家、图书馆学家,也是校勘家。他曾主持补抄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;校勘的古籍有三百多种、九千余卷。“四五十年事抄校,每从长夜到天明”是其真实的写照。张宗祥抄校的著作中,明代史学家谈迁的《国榷》是很重要的一部。

谈迁(1594~1657)穷其一生著编年体明史《国榷》,前后历时36年。顺治十四年(1657)谈迁去世后,《国榷》手稿由谈迁儿子们保管。面对这部近500万字的著作,同样穷困的谈迁后人,依然没有能力刊刻。

不久,形势越来越严峻。清朝政府开始加强文化、思想的控制。谈迁死后的第四年(1661),在湖州府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庄廷鑑(Lóng)明史案,史称“庄氏史案”。此案牵涉面广,仅处死者就有七十余人,“株连至七百家”。庄氏修史所持遗民立场,是这次“史案”发生的内因。“庄氏史案”后,朝廷下达禁野史令。

谈迁著《国榷》与庄氏修史一样,持遗民立场,也属禁书之列,自然不可能再公开露面,更不可能刊刻行世。此后三百年间,《国榷》只能以抄本形式在文人中流传。

1925年,张宗祥开始收集《国榷》稿本。首先,他找了海宁蒋氏(蒋光堉)“衍芬草堂”本过录。他在《国榷》提要中说:“甲子至永嘉,承假携行篋中,因得全抄”。这一年,张宗祥到温州任瓯海道尹,《国榷》的这一抄本就是在温州任上的两年间利用业余时间陆续完成的。后张宗祥至江南图书馆检视杭州丁氏(丁丙)的“八千卷楼”本,发现与“衍芬草堂”本缺漏相同。

1927年,张宗祥寓居上海时,又拟借刘氏(刘承干)“嘉业堂”藏明历代实录进行校正,但“心实不安”。他在《国榷跋》中解释了其中原因:“假得蒋氏衍芬草堂抄本《国榷》八十三册,阅十月,录竣,深憾缺简过多,正德、嘉靖、万历朝为甚。所载大事,或有始无终。后至江南图书馆,检丁氏八千楼旧藏,其书脱简正复相同,乃知二书实出一源。书中缺处,意欲以《明实录》补之。继思谈氏此书,系欲订正实录,今乃以实录补此书,心实不安,然卒无他资校订也。”

这时候,上海商务印书馆打算选一些书印四部续刊,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张元济征求张宗祥的意见,张宗祥便推荐了查继佐的《罪惟录》和谈迁的《国榷》。结果,《罪惟录》得以影印,而《国榷》因篇幅多,未能列入。在《罪惟录》提要中,张宗祥详细说明了当时的情况:“适张君菊生以四部续刻目就商,中有《嘉庆一统志》、柯氏《新元史》两种。予意《嘉庆志》和《乾隆志》相差甚微,而《新元史》印行不久。欲弃此二种而以《罪惟录》《国榷》二书代之。菊生云,《嘉

庆志》已排版,不及剔除。以《罪惟录》《国榷》字数计,去《新元史》即可印行。议已定,翰怡兄必欲影印原书,此书遂得印行。而《国榷》因篇幅增多,遂不能列入,故至今未印也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,张宗祥到杭州任职浙江图书馆馆长,从公之余,继续整理《国榷》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1954年,经多方寻找,张宗祥终于得到《国榷》的另外一个抄本,即四明卢氏(卢址)“抱经楼”抄本,同时还得到一个仅有崇祯一朝的抄本。“客冬(即1954年冬),得四明卢氏抱经楼藏抄本,又得一崇祯一朝十卷本,互相校补,八阅月始毕,略可讽诵矣。”张宗祥将蒋氏“衍芬草堂”和卢氏“抱经楼”抄本进行了对比,并将“抱经楼”本过抄到“衍芬草堂”本上。

在其长女张珏所编的《冷僧自编年谱》简编“1955年(乙未)”条中也有张宗祥相关的回忆:“傅彬然兄寄一拟印书目来,中有《国榷》一种。标云‘稿本’。予所见此书,自洪武起至弘光者凡三种。‘八千卷楼’本即出自‘衍芬草堂’,二种实同。‘抱经楼’本,缺者亦多,然与上二种不同。合此三本相校,较为完整可靠。”

到1955年末,74岁的张宗祥终于校补成比较完整的《国榷》,前后历时30年。他把全书厘为百卷,前十二篇定为卷首四卷,“弘光”一朝定为最后四卷,所以全书定为108卷。最后,他说:“谈先生有知,当不责予鲁莽也。”又说:“然乡先哲巨著,得此以传,亦快事也。”张宗祥先生的《国榷》抄校本,今藏浙江图书馆。

当时,古籍出版社有出版《国榷》的计划并由时任副总编辑傅彬然与张宗祥联系。因此,张宗祥校完《国榷》后,即把稿子交古籍出版社。1956年,古籍出版社给张宗祥回信,决定列入1957年出版计划。

1958年12月,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《国榷》,共108卷、420万字,有厚厚的六册。需要指出的是,古籍出版社成立于1954年6月,是出版总署直属社,1957年3月并入中华书局,但在出版《国榷》(初版)时仍署“古籍出版社”之名,后重印时署中华书局。

张珏在《父亲张宗祥》一文中说:“75岁,为《国榷》的出版,日以继夜工作。”作为浙江海宁人,张宗祥对乡邦文献一直比较重视,共抄校500余卷,在其《八十书怀》(六首之第三)中写道:“先哲遗编历劫灰,雪抄露纂笑书呆,苦搜群腋成裘日,喜报高车问字来。继述藏书左尹瞻,平章实录枣林才,乡邦文献皆传世,自慰辛勤一举杯。”

正是在张宗祥先生的持续努力下,《国榷》才得以在300余年后出版发行,并得到吴晗等历史学家和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。

谨以此文纪念张宗祥先生诞辰140周年。

食金石力 养草木心

□ 汪逸芳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人

记得好几年前,亚洲书院举办过两次趣味拍卖会。规则是一元起步,百元封顶。其中还有吴山明先生的书法助兴参拍,趣味自然是不低的。其实那是一群热爱文学与书画的朋友弄出的雅玩新招。但也就在那次,我很荣幸地拍到了阮振亚先生的《秋色秋声》图(四尺对开)。

画面上的黄菊独立寒秋,淡而弥厚,清而弥永。菊花篱笆底下的角落里躲着两只黑黝黝的蟋蟀,兼工带写,神形毕肖。我想,若没有淘气的童年,没有乱石堆里抓蟋蟀的经历,是断然画不出鼓翅高鸣、勇猛好斗的雄姿的。

阮振亚与齐白石一样喜欢画蟋蟀,只是白石老人笔下的蟋蟀总是抢主位,而他在这里却将它们一藏一露,若不细看,难以发现。年前,在我搬家整理一堆信札的时候,突然摸到了一片硬卡,以为是一张CD,举起来一看,是阮振亚在巴掌大的小卡纸上画了一对蟋蟀“冤家”,鏖战得胜负难分。

阮振亚善画蟋蟀,也喜画蟋蟀,最令人叫绝的是他曾把两只蟋蟀分别画在了两根细细的棒冰棍上,棍棒只有一厘米宽,却画得同样的精细入微,同样的一丝不苟,那需要怎样的眼力与笔力啊。这让我想起阮振亚写过的一首题画诗:“白石山翁接地气,笔下豪迈兼精致。写意并非随意画,大师亦从雕虫始。”

去年还看到过阮振亚的一幅“端午即景”小品,画面上只有粽子、枇杷和咸蛋。其中粽子有四只,三只被弯弯扭扭的麻线串着似挂非挂地巧立于空中,有一只被剥开的坦荡地躺平在长条的粽叶上,黏乎乎的米粒粒粒可感,多看几眼,恍惚间似有一阵粽香带着热气飘来,定神一看淡红色的粽尖上,还粘着几颗深深浅浅的红豆,舌尖似乎舔着了甜味!可还没等你惊呼一声,视线已经落在了切开的小半只咸鸭蛋上,那蛋黄蛋白以及蛋壳太逼真的形色让人猛地跌回了童年——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一只咸鸭蛋被切成四等分,兄弟姐妹每人一份,试问哪个家庭不是这样过来的呢?

端午画上虽然没有出现菖蒲,没有看见雄黄,却是看见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家庭过端午的缩影。

在“端午即景”中未曾出现的菖蒲,其实是阮振亚的最爱。他家里养着一盆亲手挖来的菖蒲,种活了,他喜;兴盛了,他爱。在他创作的大博古画上,常常能见到这盆菖蒲的“身影”。最近去钱塘书画研究社看展,发现阮振亚的办公桌上,多了一只种着几根小菖蒲的玻璃小茶盅,去时正好撞见他小茶盅端到行道树荫的阳光下晒。前后个把小时,他接待了好几批参观者,行将离开时,他居然没有忘记将小菖蒲收回。别看他身高达体,以为会像一般男人那样大大咧咧,画家生活的细微处也是常人所不及的。

再说那大博古画,阮振亚是把全形拓移植到了国画上,让他的梅兰竹菊千变万化地“栽”进了全形拓的器皿、印章、古砖、瓦当中,顿时让花卉有了古韵,而钟鼎器物显现了生机。

阮振亚尚古,喜收藏,也擅长根据时令画一些反映民俗的国画,而题款常常会有意出言外的戏谑味,也许可称为“冷幽默”。

比如画上明明画两只八哥,落款却是“辈分排列位至八,并非手足也称哥”,让人忍俊不禁。

晚潮专栏



陈骥

你写,我来发



·看好文,写好文,来这里·